

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方法论集

黄修己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

黄修己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208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

黄修己 编

出版发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10003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数	0,001—1,500册
字 数	256千字	印 张	10.375
版 本	1994年10月	第 1 版	
	1994年10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39-149-6/G·131		
定 价	9.00元		

终身不忘，唯此一言

(代前言)

黄 修 己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你们有兴致来翻阅这一本书，是不是因为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有点兴趣，并且希望进一步了解、学习、研究它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了。好吧，那就先请听我跟你们谈谈我为什么要编这一本书。

我想你们中间有许多是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美好的青春年华啊！我和你们一样，也曾有过一段学堂求知的生活。我想说的，也是50年代后半期，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时的事。

那时，新中国的高校已进行过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所高校的中文系合并的，集中了当时国内最有名望的一大批专家学者。我于1955年进入该系读书，躬逢其盛，实是一生之幸事。几年间饱受师长们的雨露恩泽，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这里只说授业一事。老师们的讲课，各有其长，各具特色，使我们受益非浅。本系的、外系的，各门课的授课老师，都深深地记在了我的心里。但是，无论我有多么好的

记性，也绝对无法记下他们当时讲授的全部内容。何况我的记性很一般，说老实话，绝大多数都忘了。用我们学生的话说，就是“还给老师”了。而记在我心里的，有的印象还相当深刻的，有的后来反复咀嚼、品味的，有的可以说是终身受用的，却往往只有那么三言两语，就如本文题目所说：“终身不忘，唯此一言”！

杨晦先生是系主任，他给我们开的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规定是一个学期的课，到学期结束时，杨先生讲到了夏代。50年代末还是商有乌龟壳，证明其有，夏尚未见文物出土，不知实有还是纯系传说。那么夏有什么可讲的？他说禹得天下后，便铸了个很大的鼎，叫九鼎（象征九州，故名）。此物现在何处？据说是沉到洪泽湖里去了。那讲它何用？据说因为那上面镌刻了许多山川形胜，草木虫鱼，神鬼妖怪，传说故事……等等的图像，如果我们能看到，一定可以从中了解夏时的文艺思想状况。杨先生的课，例如夏以前讲了什么，我全忘了，唯独记住这九鼎。此后看书见有“一言九鼎”、“问鼎”之类的词句，脑中立即会闪现出杨先生讲课的情景。

林庚先生讲授隋唐五代文学，林先生自己是个诗人，这阶段中国文学又以诗成就为高，当然他有许多精彩分析。不过印象最深的是讲王维的《使至塞上》。讲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林先生先在黑板上画了一道横线，说这是“大漠”。又在横线的等分点上画一垂直线，说这是“孤烟直”。然后以此点为圆心，画了个半弧，说是“落日圆”，如图：。他边画边说：“你们瞧，这多美！多美呀！”这堂课，我想我的同窗学友，谁也忘不掉。下了课，大家议论纷纷，不以为然者居多。

蔡仪先生讲美学，课安排在晚上。蔡先生口头表达不算强，在昏昏然的灯下，大家听得似乎不大起劲。然而我也记住他讲审美观念时的一个举例，他说黑人并不认为自己美，这是他做过调查的。

相比之下，周扬先生堪称能言善辩，他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美

学。其时周先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兼任北大的课，因名声甚大，听者如云，办公楼礼堂坐得满满的，许多同学还要自己带凳子坐在过道上听课。周扬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讲起课来，神采奕奕，甚能掳住人心。可惜许多具体论点我还是没记住，却记住了一件事。一位比我低一届的同学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表示怀疑，他说：为什么不用“文艺为人民服务”？又举例证明，说贝多芬的交响曲很好听，可那与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是那年暑假中央乐团到北大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这位同学顺手举了这个例子。周扬讲课善于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大概是第二堂课。正好讲“文艺与政治”，他便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说：“为什么不提文艺为人民而提为政治呢？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然后也举贝多芬的例，说他的乐曲，是歌颂资产阶级革命的，所以听到拿破仑称帝，还气愤地把本拟送他的乐章撕了。他对那位同学说：“你听了贝多芬的曲子，觉得好听，那就是因为里面也有政治嘛！你提这个问题可以，可是例子举错了，你举别的例子可以。”此时课堂上情绪活跃，大家都佩服周扬回答得好。

先说这几个例子吧，那么多名师讲课，传道授业解惑，我却记不住主要内容，尽记些鸡毛蒜皮，仅此一端，足见不是个好孩子。这我是承认的，那时没有更好地学习，为后来打下较丰厚的学识基础，现在悔已晚矣。不过这些雪泥鸿爪，能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恐怕不能说就是无足轻重的。几十年后回思往事，越发领悟了其中的道理。这些例子之引人，固然有其论点特别之故，但更因其中都含有方法上的启示，或正或反，对学生都有启发性，所以才这样印象深刻。

周扬教给的是论证和反驳的方法。后来他当然不会再去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了。但方法上的启示是久远的。我的那位同学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今天得到了承认，但他举以为证的“证据”，确是不坚实的，有漏洞的。周扬的驳难就是点出对方“证据”的脆弱，让这“证据”自我崩溃，这比另举他例来反驳，要有

力得多。俗话说“兵来将挡”，如果不必出将便令对方兵溃千里，这是多么好的战法啊！所以我们写文章，尤其是论辩性的，一定要严格地检查自己的论据，千万不要授人以柄，这也是学术研究中坚持、提高科学性的问题。

杨晦先生的“九鼎”，虽然至今还未从洪泽湖里打捞出来，但他想从古文物的图饰上探究文艺思潮的方法，却是大有意义的。他把研究文艺思潮的对象，从文学理论和创作，扩大到别的艺术门类，乃至非艺术品上去了。自那以后，我学会在生活中注意观察，把凡是与形象有关的东西，都与文艺思潮联系起来，从而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记得我第一次到厦门集美参观陈嘉庚墓时，面对那嵌满各式石雕，从古代故事到现代政治事件，从动植物标本图到日常生活，诸如早起开窗、刷牙、做操等，可用“五花八门”来概括的众多浮雕，我立即想起杨先生的“九鼎”论。我想：这里表现了什么样的审美观念呢？不是也可以做一番分析吗？因为据说这些都是陈嘉庚先生自己设计的，因此可能反映特定阶层的美感特征。可惜我不治文艺学，也没有时间去钻研这问题。至于蔡仪先生的见解，恐怕也不一定站得住。只看汉城奥运会上出尽风头的美国黑人女运动员乔伊那，我想不仅黑人，就是白人也会爱的。但蔡先生的例子，启发我们把美学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心态学等联系起来，这是有待开拓的一条路子。我尽管后来不研究文艺学和美学，但几位老师把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人类的各种审美活动结合着考察，对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也很有帮助，也许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还会继续发生影响。记得有位西方记者曾说过：“任何人都能在商店里看时装，在博物馆里看历史。但是具有创造性的开拓者在五金店里看历史，在飞机场上看时装。”我想，杨先生在九鼎上看文艺思潮，蔡先生从肤色论审美观，毫无疑问，正是创造性的、开拓性的思维方法，这是我永远要学习的。

林庚先生画图法的启发作用，属于又一类，因我当时不能与

之认同，便被逼着去想，如果林先生画的图，不能让我感到美，那么王维这首诗究竟好在哪里？想着想着，也有所收获。我认为这首诗是写“偏”、“远”、“荒”，从而衬托出戍边之苦。但无一字写悲苦，只是写景。林先生举的两句是最重要的景。“大漠”与“孤烟”，宽漠与细小，形成对比，唯其是“大漠”上的“孤烟”，才更显出那里的荒凉，什么东西都没有，只孤零零的一条烟柱。而“直”是写气候干燥。如果这烟是狼烟，当然升得高，但如不是沙漠干燥，大气湿度小，是不可能那么“直”的。而干燥也是与荒凉相关的气象。这里只用5个字写出了荒凉、肃杀的气氛，让人想起罗布泊，想起楼兰的遗址，会产生一种凄凉之感。下一句“长河落日圆”，则与“大漠”句又形成另一组对比，比较地美丽、壮观。因为落日是深红色的，其时满天彩霞，又加倒映在“长河”里，何等艳丽。有了“大漠”一句，若无“长河”一句，只剩个“苍凉”，缺少了“壮丽”，那就会使诗少点豪气，也就不符合林庚先生的“盛唐气象”论。所以这诗虽是写景，却是特定时代人眼中的景，也包含着特定的时代精神。这样的分析，用的是传统的方法，但这是我自己的思考，我因此而受了一次训练。画图的局限在于只能现其形，哪怕逼真，也难以阐释诗之“神”与“魂”^①。解诗还得靠细读法，慢慢地品味才好。这样思考之后，再去读唐诗，收获就比较大了。

然而印象更为深刻，对我做学问的影响更大的还不是上述这些，因为毕竟不是我后来从事的本行。对我影响最深的，有启蒙意义的，是吴组缃先生对鲁迅《离婚》中爱姑脚型的分析。

在我未入北大之前，吴组缃先生曾开设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据说讲得非常精彩，真是有口皆碑。可惜到我入学时，他已经全力以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不讲授现代文学作品选了。但对吴先生这门课的赞叹，仍时有所闻，不绝于耳，造成我十分向往的心情，老盼着有机会听他的课。到了四年级上现代文学史课，由几位老师“抬轿子”，吴组缃先生讲了一堂“茅盾和他的《春

蚕》”。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这门课中最受欢迎的一堂，我相信我的同窗都会赞同这一评价。这样，就更使我要设法去了解他全部课程的情况。特别是1960年毕业留校，让我担任现代文学的教学后，这种愿望就更迫切了。

那时中文系教员的集体宿舍在19斋，我的邻屋是金申熊先生（今名金开诚），他入学早，有幸听过吴先生那课。某夜，我去他屋里串门，先问他有没有吴先生课的讲义，回答说没有；又问有没有听课笔记，回答还是没有；但他说当时有人将吴先生的讲义刻印了，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失望之余只好说：那你给我举个例子也好，说说到底吴先生讲课怎么个好法？金先生说话有时也爱卖关子，慢吞吞地，很神秘地拖长调子说：“好吧！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

这个例就是爱姑的脚。吴先生分析说：鲁迅两次写爱姑的脚是“钩刀形”的，就是说她的脚既未成小脚，也不是天足。这说明爱姑小时是缠过脚的（旧时文人曾以“双钩”称女人的小脚），进入民国后放脚了，因为年轻，还能再长大点，但已无法复原，便成了“钩刀形”了。这种脚型当时人称“小大脚”、“半天足”。鲁迅通过这脚型，点出爱姑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用其脚型交代了故事的时代背景，是极为简练的。

我听了金先生此番介绍，用“茅塞顿开”来形容当时的感觉，还是很恰当的。因为以前读小说，从未注意这种小地方，想不到这里还蕴藏着历史的内容和艺术的匠心。于是转过身奔回自己屋里，从书架上抽出《鲁迅小说集》，立即从《呐喊》第一篇开始重新来读。我忘了花多长时间重读了《呐喊》和《彷徨》，但这一回，却简直是从鲁迅小说里发现了一片新天地，原来有那么多东西以前都忽略了。我还凭着当时所有的一点生活知识，体会到鲁迅写爱姑脚型时，也写她坐在船上对着对面的男乘客，双脚摆成八字形，这样写也有所用心。因为这种坐姿，不是将双腿并拢，而是八字张开，是不雅的，不合“四德”中对“妇容”的要求。通过这个

姿势，说明爱姑所受封建文化教养少，改言行有粗俗一面，但也因此较为敢说、敢干。这就为后来展开她的性格做了铺垫。

再后来呢，更明白了这就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所要求的“细节真实”，“讲究‘细节真实’有时会产生很大的艺术力量。”

总之，当时我真有一种“开窍”的感觉。无论学习哪行哪业，“开窍”都是从一个境界向高一层境界的飞跃。而要“开窍”，又与领会、掌握其基本方法相关。总述上面这些永生不忘的听课内容，大致有下述三种情况：

一是老师的观点正确、精辟，方法也是科学的。

二是观点本身不一定靠得住，或未得证明，或不能经久。但思考问题、论证问题的方法有参考价值，对学生有启发作用。

三是方法不一定完善，结论也不见得能服人；但其方法很特别，引人注意，促人思索，起到发动机上启动器的作用。对活跃学生的思想，引起他们深入钻研的兴趣，都有好处；因而可能由此引出比较好的方法来，至少提醒学生，要注意方法问题。

这三点都牵连着一个方法问题，这就是学生对它印象深、记得牢的重要缘故。你背诵100个现成的科学结论（这是需要的），可能不如领悟一种方法，更有意义。这正如《广谈助》中的一个故事，说吕洞宾的手指头能点石成金，他为了报答他人便点了一块金、两块金，那人都不要。问他要什么，回答是要你的手指头。老师传授知识，犹如给那金块，再多也有用完之日，而如果自己也有了点金术，金子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方法，就是那能点金的手指头。“终身不忘，唯此一言”，就因为那“一言”正可指导或启示你，怎样去造就那能点金的手指头！

我从以前受教的过程，体会到掌握方法的重要性。自己当了教师，就感到只在课堂上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不足，要学古人“金针度人”的精神。因此，我在教学中就比较注重方法的训练。我在北大，开过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的专题课。后来文学批评界出现了“方法热”，我对这个热潮持肯定的评价，我觉得其主要方面

是积极的。由于我较早注意方法问题，按理应该积极响应，然而却没有被卷进去。那是因为“方法热”主要内容是引进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和方法，还有尝试运用诸如“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于文学批评，以求创新。我认为应该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再看看是怎么运用的，有什么积极成果，然后考虑可否移植过来，用以评论我们的创作，并与我们传统的方法融汇成为适合于我国文学实际的批评方法。而我，连第一步弄清理论也未曾达到，凑什么热闹呢？

尽管这种态度可说是比较保守的，但我初衷未改，仍然注意学习和积累。我受吴组缃的影响最大，认为他运用的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并取得独特成果。我同样走在这条路上，坚信这种批评方法自有其价值和魅力，绝不会过时。但应该有开放的心态，不持门户之见，不把自己不熟悉或一时不理解的都视为异端，这样才能博采各种批评上的新创造，广收一切积极的精神成果，以丰富、发展自己，才不至于固步自封，可能不断地有点进步。于是承担了“七五”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本书的编辑，就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所做的准备。之所以把范围仍然限在中国现代文学内，而不去搞个“文学批评方法论”之类的题目，乃是量力行事，只想在自己本行范围内多下点功夫耕耘。但我相信本书涉及的问题，与其他文学研究部门，也有相通之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很多，许多研究家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创造，但这里入选的文章不多。这—是因为研究家们撰写的这类方法论性质的文章，至今还不算多。二与我个人孤陋寡闻有关。肯定会有遗珠之憾，这是十分抱歉的。三则我想选的，不是那种先有个什么新理论、新方法，再用之于批评的文章，而是研究家们对科研实践的总结，是他们的经验之谈，悟道之谈。这样，有一些“方法热”中的同类文章，便未曾入选。这也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为了弥补涉及面不够广泛的缺陷，今后我会再

编撰一本书，以便较全面地介绍同行们在方法论上的成就。

年青的朋友们，如果你读了这篇文章，读罢本书所收各篇论文，能够对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方法有所领悟，如果也能有我听了吴组缃讲爱姑形象后的那种感觉；那么，编辑本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不过最后还要交代一句，切勿以为有了方法便有了一切，领悟之后的具体运用，那是更艰苦的过程。达到成功，还要付出辛勤的劳动。

1992年10月

① 但前一阵“方法热”中，也伴随着画图热，出现了被称为善于以画图表达思想的林兴宅，连杨义的皇皇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有画图。就是本书所收某些论文中，也有图。这样看来，林庚先生是非常超前的。我之不能欣赏他那个图解，也许只是我童蒙未开，不能说林先生毫无道理。因为林先生是理科出身，用画图法，也许与他的特殊知识结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侮辱知识分子，北大工宣队也搞了个“突然袭击考教授”，让文科教授答数理化的试题，许多人交了白卷。林庚先生被特准回家取来老花眼镜，细细地做，成绩如何不知，至少有答案，没有被难倒。

目 录

终身不忘，唯此一言（代前言）·····	黄修己（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	王 瑶（1）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王瑶先生文学史理论、方法描述·····	钱理群（23）
杂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严家炎（44）
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	严家炎（52）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樊 骏（61）
试说新文学研究与朴学之关系·····	朱金顺（98）
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	陈思和（114）
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黄修己（134）
回归与拓展·····	黄修己（144）
——对新文学史研究历史的思考	
小说史研究方法散论·····	陈平原（163）
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	孙玉石（194）
在作家与作品之间·····	王晓明（209）
——答黄子平问	
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	董炳月（218）
关于研究鲁迅的一些问题·····	林 非（236）
近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新趋向·····	钱理群 王得后（270）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289）
文化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吴定宇（294）
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	朱晓进（304）
后记·····	（316）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王 瑶

(一)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考察，是从建国以后才开始的。它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在这门学科的短短30年的历史中，还包括了那“史无前例”的动乱的10年。在那些文化浩劫的日子里，类似农业上某些地区的“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情况，结果粮食也并不能上得去一样，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也只孤零零地剩下一个鲁迅，结果当然是对鲁迅的著作也只能得到曲解和涂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三年多来，澄清是非，拨乱反正，大家做了许多工作。而且为了适应教学工作的迫切需要，目前已经出版了好几部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总的看来，我们的科学水平还不高，距离时代和人民对这门学科的要求还相当远，我们必须多方面地进行深入的研究，努力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水平。现在我们面临四化建设的任务，要建设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攀登三个高峰，除科学技术高峰外，还有文学艺术高峰、思想理论高峰。对于建设精神文明，对于攀登思想理论高峰和文学艺术高峰，这门学科都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正像列宁所说：“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列宁全集》第38卷221页）。我们对这段文学发展历史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助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

就现代文学史的编著工作来说，它的质量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整体的学术水平；如果各种各类专题性的研究尚未取得公认的、富有科学性的成果，那么作为综述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就很难超越一般的介绍文学现象的水平。除此之外，作为一门学科，现代文学史也有它自己的性质和特点，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的规定性，充分体现这门学科的特点。

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文学史家要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要总结经验、探讨规律，就必须在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特点来。文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它不同于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等别的历史科学，这是很清楚的；但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这就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这三者都是以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其一致性，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讲作家作品，文学批评可以评论一个作家或者分析他的几部作品，文学史虽然也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这不符合文学史的要求。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用列宁的话说，历史科学“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列宁全集》第29卷430页）要正确地阐明文学的发展，就必须从历史上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重要现象的发展过程。写文学史与编“作品选读”不同，作品选是根据某一标准或适应某类读者的需要编选的，并不表示没有入选的作品就不好；但文学史就不同，不论它写得多么简略，讲一个作家和不讲一个作家，讲一个作品和不讲一个作品，讲多讲少，无论繁略都意味

着评价。文学史上说这个是杰出作家，那个是伟大作家，都有和其它作家的联系比较问题。它和文学批评只就某一作品进行分析是不同的。文学史当然要以作家的成果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但必须把作品放在历史过程中来考察，不能只分析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还要探讨它的历史的地位和贡献。文学史不仅要评价作品，还要写出这个作品在文学史上出现的历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联系。它给文学史增添了些什么，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和创作道路，也有和他同时代的人、和写同一题材或体裁的人的互相比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感到作家作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才能看到作家用他们的劳动如何丰富了文学史。例如讲《雷雨》，如果只分析周朴园和繁漪的形象，只讲戏剧冲突的构成，这只是作品分析的讲法。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就要注意到在《雷雨》出现以前，基本上没有大型多幕剧，《雷雨》是第一个能演三、四个小时的多幕话剧。《雷雨》推动了我国戏剧文学的发展和艺术水平的提高，抗战时期多幕话剧的创作就达到了120余种。文学史中讲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更要和一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相联系，要着重考察它对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才可避免把文学史写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汇编。

文学史不但不同于文学批评，也不同于文艺理论。虽然文学史和文艺理论都要探讨和研究文艺发展的规律，但文艺理论所探讨的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不同于文学史所要研究的特定的历史范畴。文学史必须分析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它的规律是渗透到现象中的，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形式体现的；因此必须找出最能充分反映本质的现象，从文学现象的具体面貌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现象比规律更丰富”，因为“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反对把规律、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所以不但不能“以论代史”，而且

也不能“以论带史”，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反杜林论》）我们进行研究时当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但它绝不能成为套语或标签，来代替对具体现象的历史分析。不讲文学现象，就不能构成文学史。因为某一现象除了它和许多其它现象所共有的同一本质以外，还包含有不同于其它现象而为其所独有的纯粹个别的因素，这就好像社会发展史不能代替某一国家的通史一样。文学史研究具体现象有助于反映和丰富规律，但不能只抽象地以理论来代替它。文学史要求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可见虽然文艺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都是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都属于文艺科学的范围，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学史是具有它自己的性质和特点的。

作为文学史的方法论来看，鲁迅的许多具体实践仍然给我们以巨大的启发，可以认为是研究文学史的典范。例如他把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关于酒和药同文学的关系，我们已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得知梗概，女和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影响，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但它既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和文人的生活与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中古文学史的特征的。他把讲唐代文学的一章取名为“廊庙与山林”，那是根据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对现实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加以概括的，其意盖略近于他的一篇讲演的题目《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目的是由作家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来分析作品的不同倾向的。他善于捕捉带普遍性的能够反映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来论述，其中就体现了规律性的认识。这些章节安排大概是他广州中山大学拟定的，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鲁迅曾和他谈过大意，但这项工作并未完成。就已经写成的著作来说，我们